

Mao Zedong's Strategic Guidance on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

□ 度 平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毛泽东从战场实际出发，正确地实施战略指导：一是从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指导中共中央统一思想并作出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战略决策；二是指导志愿军先后发动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三是指导中朝军队以打促谈，边打边谈，最终实现有利条件下的停战；四是指导中共中央确定“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对今天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仍有重大的启示。

关键词：新中国军事史 毛泽东 抗美援朝战争 战略指导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13)04-0010-08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站在国际政治和国家民族利益的战略高度，从战场实际出发，正确地实施战略指导并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从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指导中共中央统一思想并作出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战略决策

回顾毛泽东指导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战略决策的背景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之所以必须出兵抗美援朝，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台湾和东北边境，中国不得不战。正如基辛格在其最近撰写的《论中国》一书中所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这场战争变成了与中国的对抗”^①。1950年6月26日，战争爆发的第2天，美国立即调动其驻日本空军和海军部队侵入朝鲜，全力支援和掩护韩国军队作战。7月上旬，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指挥的“统一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号，组成先后有美国、英国、法国等16个国家参加，由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任总司令的所谓“联合国军”，直接开入朝鲜半岛作战。接着，李承晚把南朝鲜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10月上旬，麦克阿瑟指挥南朝鲜军队和“联合国军”先后越过三八线，迅速向北突进。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如果没有遭遇到中国或者俄国的抵抗，而且能够肯定会在战场取得胜利的话，就去横扫整个北朝鲜”，“引诱他向中国边界的鸭绿江推进”，^②进而威胁中国大陆。与此同时，自8月27日起“侵朝美机连续侵入我东北境内进行轰炸和扫射。截至11月10日止，美机共侵袭我东北88次，我国人民

^①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121页，北京，中国出版社，2012。

^②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著，牛可等译：《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97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死8人，伤44人，并有机车、房屋等被毁。”^①9月20日，美国军舰在山东半岛成山角附近袭击中国商轮“安海”号；10月7日，美国飞机侵入山东半岛侦察并对中国渔船进行扫射。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麦克阿瑟，扬言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结束战争，并命令侵略军向鸭绿江边推进。不仅如此，美国还把朝鲜战争直接和阻挠新中国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派遣其驻菲律宾的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空军亦随着进入台湾，公开侵略中国领土和领海。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正式提出“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②麦克阿瑟回忆，他当时接到这样的命令：“令美国第7舰队隶属我的指挥之下，遏止中共自大陆攻击台湾”，使台湾和大陆处于“隔离状态”。^③显然，美国入侵朝鲜的同时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致使新中国经济恢复工作和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遭到严重干扰，国家统一和安全以及人民生活已经遭受严重的外来威胁。正是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以其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其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指导中共中央作出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重大战略决策。

回顾和研究毛泽东指导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战略决策的过程，还能够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是在多次采取和平手段无效的情况下，艰难地作出决策。毛泽东并不是从美国开始干预朝鲜战争时，就指导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战略决策，而只是针对美国派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以及派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事实，严正地表示中国的反侵略态度。6月28日，毛泽东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是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④。当日，针对6月27日杜鲁门的声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第7舰队

的行动，“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⑤

毛泽东也不是在美国不顾中国严正的反侵略态度、继续向朝鲜半岛派兵，为进一步扩大朝鲜战争作充分的准备的情况下，就指导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战略决策，而只是为了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指导中共中央作出推迟解放台湾的决定，并重新调整了国防部署和军事战略。其中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将部署在中原地区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在东北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以及其他地区的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等共25.5万人，调往安东、辑安、本溪，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9月6日，中南军区第50军奉命北上，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新建东北边防军，是准备“用志愿军的形式”，“适当选择时机”^⑥帮助朝鲜。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战略意义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正是因为我们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⑦

毛泽东是在确知美国有越过三八线进一步扩大朝鲜战争的侵略计划后，中国多次采取外交手段包括向美国提出严重警告而无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指导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战略决策。1950年9月15日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考虑过美国“打到三八线后是否会停

① 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6日。

② 载《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

③ 《麦克阿瑟回忆录》，208页，台北，台湾文国书局，1985。

④ 载《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

⑤ 《周恩来年谱》，上卷，5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⑥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1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⑦ 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止，而后转为外交的谈判”^①。但是，美国根本没有这个打算。9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得到的情报是：美国要打过三八线，继续扩大朝鲜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运用外交手段，力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因此，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②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向北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在这种严重形势下，金日成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当日，毛泽东还接到斯大林关于要中国支援朝鲜的来信和表示苏联要与中国联手支援朝鲜的来电。得到这一信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研究是否出兵问题的同时，还在采取外交手段，希望能够制止美军越过三八线的侵略行径。10月3日，由周恩来出面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转达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③当日，杜鲁门就从国务院收到的电报中知道了周恩来约见潘尼迦谈话的主要内容：“如果联合国军队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军队援助北朝鲜人。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这种行动。”那么，杜鲁门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呢？他一方面认为，“周恩来的声明只不过是联合国的恫吓”；“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潘尼迦“充其量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同时，杜鲁门更考虑到了中国出兵朝鲜参战的可能性，并训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项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以应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变”^④。麦克阿瑟回忆说：“我所接的命令，极明确地是挥军北进”^⑤。10月7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并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

在南朝鲜军队已经打过三八线，美国不顾中国的严重警告硬是要打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

国大门口的情況下，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和斯大林的意见，毛泽东认真思考中国是否派兵赴朝参战的问题。他从实现国家统一、巩固国家安全和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反复思考后，得出中国派兵赴朝作战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科学判断。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⑥

毛泽东在拿定主意后，进一步思考着中国出兵朝鲜参战的两个重大问题。他认为：“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要能解决问题，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两个问题如何解决？毛泽东根据国际政治格局和朝鲜战争形势认为：“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而“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

①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② 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③ 周恩来同潘尼迦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

④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424、42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⑤ 《麦克阿瑟回忆录》，225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6卷，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①10月2日，毛泽东把上述战略思考，拟成一份回复斯大林的电报，准备和他进一步磋商。但是，在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时，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在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时，还转告说：关于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②从10月2日到5日，中共中央开了3天会议。在这3天会议中，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其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负担不起，等等。^③毛泽东在听了这些出兵的不利情况后，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④根据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回忆，在这次会议期间，对于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⑤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10月7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并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去苏联通报中共中央决策情况和与其详细讨论有关问题。10月19日，志愿军奉命渡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二、指导志愿军先后发动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

在志愿军赴朝参战前，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思

考中国军队如何才能战胜“联合国军”的问题。他对敌我武器装备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在总的战略上“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⑥第一个时期可以专打有把握打赢的南朝鲜军队，“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初步确定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是：“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第一个时期进行防御作战”，“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优势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⑦志愿军入朝后，10月21日，毛泽东根据“联合国军”因没有料到志愿军会参战，“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的战场实际情况，决定改变既定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判断南朝鲜军首都师、第3师、第6师、第7师、第8师分别北进的“最后目的地是江界、新义州一线”，估计其首都师、第3师要7天左右才能进到长津，然后折向江界。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极好的战机，多次指示彭德怀“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南朝鲜军第6、第7、第8等3个师。并强调“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

①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② 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

③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118页。

④ 《彭德怀自述》，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⑤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7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⑥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2日。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252、258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谈攻击的问题”。^①

这是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毛泽东十分重视。他把打赢这一仗视为“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毛泽东指示志愿军要“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望彭德怀等“精心计划实施之”。他还指示彭德怀，在部署这个战役中，“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二是为避免敌军飞机杀伤，志愿军要“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三是要在美国再调5~10个师来朝鲜之前做好部署，“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四是要“诱敌深入，利于歼击”，“捕捉战机最关紧要”。1950年10月25日~11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在清川江以北歼灭运动之敌，经12昼夜激战，歼敌1.5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至清川江以南，粉碎其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达到毛泽东在志愿军出国前所预想的战略目的：“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②

在第一次战役后，根据毛泽东适时提出的有关战略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在短短的8个月内，又先后进行了第二至第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此后，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交战双方转入战略防御。

三、指导中朝军队“以打促谈，边打边谈”，最终实现有利条件下的停战

在中朝军队的不断有力打击下，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终于认识到，在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尽管自己有强大的军事优势，但由于兵力不足等原因已无力再打到鸭绿江，实现其既定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更加无望了，不得不转

向谋求停战谈判。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朝鲜战争出现了毛泽东早就希望并为之努力过的和平解决问题的转机。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成双方谈判的实现，并通过谈判使朝鲜问题能够公平合理地解决。

6月3日，毛泽东同金日成在北京商谈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双方都认为“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③，需要与斯大林商量解决。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高岗和金日成，就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提出一些设想：“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苏联有所表示，另一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④不久，斯大林采纳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之后，为了创造实现谈判的良好条件，毛泽东和金日成商定“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为了使谈判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毛泽东还致电金日成和彭德怀，要他们要做好“打”和“谈”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人民军和志愿军应当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乘机获逞。另一方面，你们两人马上会商一次，就和平谈判问题加以考虑，准备派出适当的谈判代表，并以你们考虑的意见和谈判代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268、27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268、269、278、279、283、285、252页。

③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5日。

④ 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

表的人选告我。”^①

毛泽东在为即将到来的谈判作重要准备的同时，深知美国不会轻易认输，一定还要靠现代化的优势装备，搞政治讹诈甚至武力威胁等手段，阻碍朝鲜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因此，要通过谈判使朝鲜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必须在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必须防止敌人新的军事进攻，必须立足于打。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官兵要“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②根据聂荣臻的回忆：“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我们认真地贯彻了这一方针”。^③彭德怀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并在7月1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特别强调说：“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须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均有利。”^④毛泽东指示彭德怀，要“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要“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⑤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不久，当美国方面提出要将军事分界线划到朝中阵地后方的提议遭到驳斥拒绝后，并以武力相威胁，发动夏秋季攻势时，志愿军举行战术反击，粉碎其夏秋季攻势，迫使其于10月25日回到谈判桌上。11月27日，双方初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决定以实际接触线（这条分界线与中朝方面原来主张的三八线差不多）为界，双方军队各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作为非军事区。当谈判进入遣返战俘问题时，美方为达到其强迫扣留中朝方被俘人员的目的，一再坚持其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并于

1952年10月8日公然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使停战谈判中断了近5个月，企图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来结束朝鲜战争。结果，在中朝军队的不断打击下，加以各方面的压力，1953年4月26日，美国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为了促进谈判顺利进行，尽早结束朝鲜战争，毛泽东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是：“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⑥根据这个方针，志愿军于5月发起夏季反击战役，迫使美国基本接受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6月8日，停战谈判就关于战俘安排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当双方进入重新校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协定的细节工作时，南朝鲜拒绝停战协议，还公然破坏协议，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果断地作出再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6月21日，他致电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⑦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于7月13~16日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共歼灭南朝鲜军队7.8万余人，收复失地167平方公里。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

四、指导中共中央确定“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央人民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502、51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530页。

③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740、741页。

④ 《彭德怀军事文选》，3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⑤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1年6月11日。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217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⑦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3年6月21日。

政府正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上。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了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950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2次全国财政会议，确定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同意。此后，整个1951年的财经工作是围绕着这一工作方针进行。

在如何正确处理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经济工作等关系上，毛泽东深思熟虑并形成了一个战略指导方针。这就是1952年8月所说的：“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毛泽东认为，从总体上讲，“边打”的工作，在中朝军队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并且开始了停战谈判的工作。“边谈”的工作，是交战双方的事，“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①毛泽东在指导“边打”、“边谈”工作的同时，还精心指导“边稳”的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对国内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是很担心的。1952年8月，他说：“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为了解决“不稳”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1951年9月开了一次会议，提出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0月，毛泽东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于是到12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到1952年8月，毛泽东觉得“边稳”的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高兴地说：“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②

在毛泽东同意的“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与他提出的“边打，边谈，边稳”的国内工作战略指导方针之前，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新中国成立不久，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就首次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这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后，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看得更加清楚了。到1951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把这个设想修改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3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在大规模地打着，但国内经济建设恢复工作仍然顺利进行，并且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打了1年后，毛泽东指导的“边打、边谈、边稳”工作和国内经济建设工作，都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国内经济建设的前景十分看好，使毛泽东信心满满。1951年11月11日，他在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说：“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③事实也是如此。到1951年底，中国财政保持着奇迹般的良好状态，这年财政预算中赤字占总支出的14%，决算时只占11%左右。打着这样一个大仗，国内还开始有了重点建设，而财政赤字只比上一年增加2.5%。这不能不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5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50页。

^③ 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电，1951年11月11日。

说是巨大的成功。^①

到了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取得的成绩比预想的好得多，国民经济建设工作已经摆到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开始重点注意如何处理国民经济建设与“边打，边谈，边稳”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边谈”的工作，中朝一方“只能作一半主”，而“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②另外，根据1951年用于抗美援朝战争和用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费用的比例，毛泽东估计1952年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要大幅度减少。1952年8月，毛泽东说：“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③这样，国家就有条件加强国内经济建设，应该把“边建”提到重要的地位。于是，根据朝鲜战局和中朝与美国进行的停战谈判形势，为了把战争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为了使“边打，边谈，边建”的战略指导方针同“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设想有机地衔接起来，毛泽东开始考虑用“边建”替换“边谈”。同年5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又称“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这个方针确定后，同年8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毛泽东结合中央正在加快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谈了对建设工作的殷切希望。他说：“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④这个新的指导方针确定后，很快就落实到各方面的工作中。1952年5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传达“边打、边稳、边建”方针，使之贯彻落实到军队一切工作之中。5月21日～6月5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进一步确定编制1952年财政预算要以建设为第一位，军事为第二

位，行政为第三位。会议强调财政工作要放在和谈有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的基点上，陈云强调“要依靠现有基础，争取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⑤这以后，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指导下，各方面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抗美援朝战争、稳定市场和国民经济建设三方面，互相兼顾，互相促进，既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和市场的平稳，又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主义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⑥正如刘少奇所指出：“我们一方面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各项伟大的社会改革和巨大的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但我们一直保持了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和市场物价的稳定，并初步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我们很好地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预料到的。”^⑦

作者：庾平，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田越英

① 参见《周恩来传》，10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51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51页。

④ 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讲话，1952年8月4日。

⑤ 《陈云年谱》，13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⑥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⑦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6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